

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

葉惠芬

摘要

政府遷臺之後，總統蔣中正即著力於反攻大陸的使命，但因海峽兩岸實力懸殊，渡海反攻確實十分艱鉅，而在複雜的國際情勢下，進行軍事反攻又牽涉多端，作為蔣中正最得力助手的陳誠，在擘劃政務、穩定政局之餘，如何協助蔣中正完成反攻大陸使命，成為他無可逃避的重任。惟在目前既有的研究中，無論反攻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作戰計畫、光計畫、武漢計畫或國光計畫等，幾乎都是蔣中正命令參謀總長或軍事要員組成的團隊所修改制定，似乎較難看到陳誠的身影。但以陳誠地位的重要性而言，有必要詳細檢視他在蔣中正反攻大陸計畫的策劃、制定、準備、檢討等相關過程中有否參與？參與程度如何？參與了哪些部分或項目？又發揮了怎樣的影響。本文即嘗試探討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並按照他初任行政院長、獲選副總統，再度兼任行政院長三個階段，分成反攻內閣之理想與現實、反攻方案之研議、草山爭論與反攻備戰計畫之推進等三節，希望能較全面的檢視陳誠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計畫發揮的影響力，並由此觀察政府遷臺後反攻大陸之進行概況。

關鍵詞：反攻內閣、草山爭論、中興計畫、國光計畫

Chen Cheng's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Planning of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Hui-fen Yeh *

Abstract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ved to Taiwan,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focused on the mission of recovering Mainland China.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sparity in military powe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a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urthermore, a military counterattack was complex and problematic. As the most senior assistant to Chiang Kai-shek at the time, Chen Cheng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task of helping Chiang manage the government, stabiliz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omplete the mission of recovering Mainland China.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lmost all of the plans of counterattack, including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combat plans, the Light plan, the Wuhan plan and the Guoguang plan, etc., are described as being prepared by a team appointed by Chiang Kai-shek, which consisted of the Chief of Staff and other military personnel. It seems difficult to see Chen Cheng's involvement in this effort.

Nevertheless, in terms of the importance of Chen Cheng's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in detail whether he participated in the planning, formulation, preparation, review and other related processes of Chiang Kai-shek's counterattack plans. How much was the level of his participation? Which parts or projects did he participate in? What effect did his participation hav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Chen Cheng's first term as Head of the Executive Yuan, his election to Vice Presidency, and his second term as Head of the Executive Yuan, our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mplementing counterattacks, presiding over counter-attack supervision meetings, Caoshan debates and war prepar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ould help us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Chen's influence on Chiang Kai-shek's planning of recovering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d light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erattack plans against the Mainland after the government's relocation to Taiwan.

Keywords: Counterattack cabinet, Yangmingshan Conference, Zhongxing Plan, Guoguang Plan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

葉惠芬**

壹、前言

1949年政府播遷來臺之後，鞏固臺海安全，進而反攻大陸，成為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念茲在茲的重要目標。作為蔣中正得力助手，有「小委員長」之稱的陳誠，先是受命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為政府遷臺預作部署，待1950年3月1日蔣在臺復行視事，陳誠即出任行政院長；1954年又當選為第二任副總統，辭卸行政院長；1957年成為中國國民黨副總裁；1958年以副總統兼任閣揆，權勢達於顛峰，至1963年辭行政院長，仍以副總統兼國民黨副總裁身分，參與國政，直至1965年3月5日逝世止。在臺時期的陳誠，可以說一路備受蔣之器重，致力擘劃政務，盡心輔佐，為保衛臺灣，進而反攻大陸奉獻心力。

但海峽兩岸實力懸殊，進行反攻畢竟為傾全國之力的大事，絕非蔣中正或少數軍事大員即可完成此項艱鉅任務。在臺時期的陳誠，雖然以經濟改革成績受到矚目，但既受蔣之倚畀，在強調隨時準備反攻的年代，對反攻計畫之參與自不能免；且陳誠也從不避談反攻之責，曾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中表示：「大陸

* 本文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訂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11月19日。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是在我們手裡丟的，無論怎麼說，也應當在我們手裡得回來才對。」¹ 惟在目前既有的研究中，無論反攻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作戰計畫、光計畫、武漢計畫或國光計畫等，幾乎都是蔣中正命令參謀總長或軍事要員組成的團隊所修改制定，似乎較難看到陳誠的身影。² 讓人好奇陳誠在蔣中正反攻大陸計畫的策劃、制定、準備、檢討等相關過程中有否參與？參與程度如何？參與了哪些部分或項目及其影響性如何，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然而反攻大陸牽涉複雜，特別是1954年12月2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換文中規定「凡由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所產生之軍事單位，未經共同協議，不將其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臺灣與澎湖）至足以實現減低此領土可能保衛之程度」。此意味任何反攻大陸行動必須得到美國的批准和同意。關於美國對臺灣反攻大陸抱持的態度，學者著力甚深，如張淑雅、林孝庭均有一些論文或著作發表。³ 本文同意他們關於美國嚴格限制臺灣反攻的看法，但希望從臺灣內部領導者蔣中正和陳誠的角度出發，探討他們如何思考突破外交困境，並進行內部的動員與備戰計畫。

另一方面，在臺的蔣中正除了重用陳誠，同時也極力栽培長子蔣經國，讓蔣經國掌握與反攻密切相關的情報和敵後作戰，隨著蔣經國可能接掌大位的傳聞不斷，加上陳誠施政時有自己的定見，對蔣並非百依百順，蔣陳的關係因而引發關注。陳紅民對在臺時期的蔣陳關係曾為文加以探討，對1961年7月2日，陳誠主持陽明山會談期間的蔣陳草山爭論，亦有著墨，他從蔣陳權力鬥爭的角度，認為草山爭論是陳誠最後對蔣的宣洩與抗爭。⁴ 這個觀點筆者認為需要更多史料，更全

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285。

² 如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17-84；柴漢熙，〈蔣中正總統反攻大陸政策—計畫與實踐〉（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又如葉惠芬，〈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以「武漢計畫」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0期（2016年12月），頁147-193。

³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頁231-290；張淑雅，〈無礙反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的說服與宣傳〉，《國史館館刊》，第48期（2016年6月），頁103-174；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⁴ 陳紅民，〈合作中的波折—1960年前後蔣介石與陳誠關係之研究〉，收入吳淑鳳、薛月

面地檢證。

因此，本文擬搜檢國史館典藏之《陳誠副總統文物》、《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蔣經國總統文物》、《嚴家淦總統文物》等檔案及陳誠、蔣中正等日記史料，以較少人關注的陳誠對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為核心，按照他初任行政院長、獲選副總統，再度兼任行政院長三個階段，分成「反攻內閣」的理想與現實、反攻方案之研議、草山爭論與反攻備戰計畫之推進等三節，希望能較全面的檢視陳誠對蔣中正反攻大陸計畫的參與及影響，並由此觀察政府遷臺後反攻大陸之進行概況。

貳、「反攻內閣」的理想與現實

眾所周知，陳誠早於1948年秋大陸局勢普遍惡化之際，來臺養病，所以當年底他受命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對臺情況已有相當的了解。在臺灣省政府主席就職記者會中，他揭示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施政重心，希望穩住臺灣，「成為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來擔負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⁵ 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進行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入出境管理等諸多興革，臺灣政經情勢有顯著的改善，確為政府遷臺奠定了基石。

另外，自共軍渡江南下，南京、上海相繼失守，東南各省岌岌可危之際，蔣中正為臺灣防務著眼，召開東南區軍政會議，決定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1949年8月15日，陳誠正式出任公署長官，主持東南地區軍政事宜，收編整頓撤退國軍，期能阻止共軍南下攻勢，最後雖然無力扭轉劣勢，但在他努力之下，也獲致一些戰果，如於鼓浪嶼予共軍重大打擊、空軍也曾炸沉投共的長治號軍艦。⁶ 另

順、張世瑛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3年），頁987-1012。

⁵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485-486。

⁶ 張嘉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國共內戰（民國38年8月-民國39年3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07；陳亮州，〈海峽戰局謀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計畫之分析〉，《檔案季刊》，第12卷第2期（2013年6月），頁5。

外，金門古寧頭大捷和舟山登步大捷，更成功地將國共戰火阻卻於臺灣海峽之外，奠定後來臺澎金馬安定繁榮之基礎。⁷

雖國事日壞、大局呈土崩瓦解之象，但陳誠主持臺灣省政和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卻為他累積了豐富的主臺經驗及軍政實力，而且讓他能更全面的構思一套以反攻大陸為目標的臺灣安全防衛概念，自然也成為他再創政治生涯高峰的重要憑藉。1950年3月蔣中正復職，陳誠順理成章地接任行政院長，兩人成為生命共同體，長達十五年的蔣陳體制宣告確立，保衛臺灣之餘，領導國人反攻大陸，就成為蔣陳二人共同努力的中心目標。

直至1954年5月就任副總統，辭行政院長止，陳誠第一任行政院長任期四年。對這四年，他說：「我剛就任行政院長，就有人推斷：這是『反攻內閣』。從『反攻內閣』四個字上，可以看出大家對我的期望多麼殷切。」⁸ 民眾殷切期望政府反攻，但財經困難、實力不足以及外交的困境，均使反攻成為政府高懸的理想，陳誠了解現實困難，只能保守以待，所以就任的第一年，他說：「三十九年，也是我們做必要反攻準備的一年。」⁹ 易言之，「反攻內閣」的實質即為反攻之準備。以下分述他準備反攻的思考及計畫行動：

一、強調反攻大陸是政府中心任務

陳誠一接任行政院長，在官邸接見中外記者時，發表談話稱：「今後一切措施，當恪遵國父遺教，以臺灣為三民主義實驗區，遵照總統訓示，鞏固臺灣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確保全體生命財產之安全，並積極作反攻大陸之準備。」但盱衡大局，國家困難已極，陳誠只能思考如何治理，才能「一方面不竭澤而漁，一方面還能完成反攻復國的使命」。¹⁰

1950年3月31日，陳誠至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時，同樣宣示將「竭盡一切力

⁷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158-159

⁸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282。

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283。

¹⁰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106-107。

量，確保以臺灣為中心的基地，準備反攻大陸。這是政府當前的任務，今後外交、內政皆當以達成這一中心任務為目的」。¹¹ 更具體的說，陳誠提出：「在政府方面，少用一分力量於生產和戰鬥無關的業務，就是減輕一分民眾的負擔；在民眾方面，多用一分力量於生產和戰鬥有關的工作，就是增加一分勝利的把握。政府的政略和戰略必須以財政、經濟為準衡，而人力和物力要使用得切當，使用得有效，要以精神的力量彌補物質的不足，更要以公平的措施均衡民眾的負擔，才能達到增進生產、持久作戰的目的。」因此，他強調「反攻復國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力量問題。所謂力量，武裝方面的固很重要，而財經方面的尤為重要；因為武裝力量的命脈就是財經。財政、經濟的難關打不開，反攻復國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¹²

6月27日韓戰爆發，蔣中正曾考慮派兵入韓參戰，又隨著中共出兵援助北韓，蔣更進一步有將派兵援韓與反攻大陸問題結合的想法，但終因美國多方考量而作罷。¹³ 雖然反攻時機未到，但對蔣已是莫大的鼓舞，所以在7月2日，陳誠擬訂對立法院施政報告，指示明年施政計畫中最重要的即為反攻大陸計畫之擬訂，並說明此項計畫應分為三部分，一為反攻前之準備工作，其重點為在大陸上建立反共武裝及反共政權，應由國防部籌劃辦理；二為反攻時軍政兩方面各種臨時措施及辦法，由各部會分別編擬；三為反攻後有關各項重要政策及設施。他又提示反攻前準備工作，應注重儲訓幹部，預定儲訓3萬人，應即列入計畫並編列預算。這些都在向立法院提出的1951年度施政計畫綱要中具體呈現。¹⁴

了解反攻並非一蹴可就，針對立法委員質詢何時反攻的問題，陳誠在1950年10月3日答詢時表示：「大家關心軍事，希望趕快反攻，但也不能不自量力。退來臺灣的軍隊，說它是部隊也好，說它不成部隊也好。經過一年整訓以後，雖尚未能達成理想，進步仍然是很大。……我們整訓軍隊的目的是反攻，但反攻必須

¹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555。

¹²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115。

¹³ 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頁261-266。

¹⁴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568-569；「行政院四十年度施政計畫綱要」（1950年10月），〈行政院施政資料—四十年度〉，《陳誠副總統文物》（以下簡稱《陳誠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501-00050-001。

配合時機，只要我們有力量準備，反攻的機會是隨時有的。我們來到臺灣，絕不是逃難，絕對不是苟安。」¹⁵

在不能立時軍事反攻的情況下，陳誠在1951年度施政計畫中提出培育增建大陸的游擊隊武力，作為反攻時策應的力量，及選派忠貞幹部潛入敵後增建反攻政權，以加強政府領導力量的替代方案。10月4日，又在行政院院會上具體提出「加強匪區工作，設置統一籌畫機構之審查意見案」，指示：「設一小組，由參謀總長主持，本院有關各部會政務次官參加。」¹⁶也隨即於18日的院會前得到蔣批核：「准如所議辦理，惟此項匪後軍政工作小組應即由行政院限定期限，責成從速成立。」並要求從速擬定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¹⁷

12月20日，陳誠再度向行政院院會提出加強游擊鬥爭案。其辦法：1.加強大陸游擊鬥爭之計畫、人事、指揮等事務，統交參謀總長周至柔負責；2.暫先撥專款一千萬元，以備運用；3.在半年內建立若干據點，並予中共不斷之打擊；4.發動大規模破壞反抗工作，以證明我在大陸上之潛在力量。此案通過後陳誠又指示：「本案所列經費預算，係國防部參照一個師之預算作依據。但此項經費並非直接用於匪區，而是專作游擊隊領導人員由臺赴港轉赴大陸之旅費。如欲以此區區之數，解決大陸游擊之裝備與補充，自非易事。若干確具領導能力兼有奮鬥精神之同志，因限於旅費，無法自行返回大陸領導游擊，政府資助他們回去，將來收穫極大。同時游擊武力應任其在奮鬥中成長，與其助以裝備武器，毋寧盼其自行發展。」¹⁸換言之，他認為游擊隊在反攻上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並不贊成全力裝備游擊隊進行反攻，與蔣後來利用柳元麟緬北游擊隊進行武漢計畫，態度顯然有所不同。

主持內閣的陳誠對財政入不敷出情形深有體認，也明白政府為了防備中共犯臺，1951年軍費比重高達80%，甚至繼續增長，已為美方詬病，要進行軍事反攻談何容易？¹⁹比較好的方式只能寄望自由世界團結起來，一致反共。所以自1951

¹⁵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586。

¹⁶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587。

¹⁷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586-587。

¹⁸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00-601。

¹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345。

年下半年起，陳誠說：「我們已放棄了『捨命戰』式的反攻，而開始等待一種有利時機的到來而後反攻。」等待有利時機，並計策萬全，而在等待期間，「我們的軍事反攻雖不可能，但是『政治反攻』、『經濟反攻』、『文化反攻』則是好好的做一下的——我們不妨統稱此種反攻為精神反攻」。²⁰

11月14日，陳誠主持第二一一次行政院院會，為了提出新年度施政計畫綱要，陳誠擬妥前言後又仔細思索，找來副院長張厲生與秘書長黃少谷研究，並告訴他們：「一般人觀念上總以為反攻是純軍事上的事，應當加以挽正，強調政治經濟反攻的重要性。今天在臺灣最重要的是經濟，一定要加強經濟力量，用以支持軍事力量，才有反攻之可言。」²¹ 財經發展自此成為他施政的重心。1953年3月，在行政院의 檢討會議上，陳誠更是明白的講：

反攻大陸的需要是什麼？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力量，第三還是力量。力量從哪裡來？主要是從建設臺灣的過程中來培養，來積聚，來發揮。再明白地說，反共抗俄應以軍事為中心，但軍事力量的維持和增長，要求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的努力。²²

雖然因內外情勢複雜，反攻任務此時仍難實現，只能暫時以小規模局部的突擊東山島或李彌滇緬游擊隊反攻雲南等形式進行，但在四年行政院長任期當中，陳誠仍不斷的呼籲「繼續提高戰力，加強反攻準備」等言論。²³ 直到1954年4月13日，陳誠列席立法院報告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時，總結四年的成果，指出：「一切措施仍應本四年來一貫的政策，以積極加強反攻大陸的準備為中心，以期把握有利時機，早日收復大陸。同時尤須加強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充分發揮總體戰的功能。」²⁴

²⁰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285。

²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73。

²² 〈行政院檢討會議閉幕〉，《中央日報》，臺北，1953年3月18日，版1。

²³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770、779。

²⁴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851。

二、籌組行政院設計委員會

從政府遷臺之始，蔣中正即指示進行收復大陸後各項準備工作，陳誠接任行政院長後，在1950年8月9日向院會提出成立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以下簡稱設計委員會），16日院會通過設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12月27日通過聘任閻錫山等168人為設計委員，由張厲生、朱懷冰分兼正副秘書長。該會配合行政院業務性質，分政制、內政、軍事、財政、經濟、教育文化、司法、交通、土地九個小組委員會，至1951年8月又增設邊疆、市政兩個小組，另為處理研討綜合性方案及與各小組有關問題，由各小組召集人組設召集人聯席會議，合為12個單位。²⁵

1951年1月16日設計委員會正式成立，蔣中正蒞臨致詞，強調作為籌劃將來建國大業的設計工作之重要性。²⁶而兼任主任委員之陳誠在會中也宣示「本會設立之主旨，在集中全國才智之士，以完成反共抗俄之使命」，並提示設計之範圍與步驟分為反攻前、反攻時與反攻後，反攻前應注意思想、政治與經濟反攻，以為軍事反攻之前驅；反攻時，固應以軍事為中心，但戰地政務與人民組訓工作，尤須注意；反攻後則應努力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之建設，以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理想。另提示立意要久遠、辦法要平易、文字要淺近等三個設計原則。²⁷

在此後的三年多時間，蔣中正和陳誠均反覆強調反攻設計工作的重要性，並思考加強設計的成效，如1952年6月30日，蔣指示設計委員會應改革之點：「一、改正觀念：甲、本位主義；乙、地域主義；丙、舊有觀念。二、設計機構之有效運用。三、設計委員之本職在如何使軍政提高效率，造福人民。四、應加強綜合小組。五、統一觀念之確立：甲、所謂民主政制，尊重憲法與法制；乙、

²⁵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工作總報告」（1954年10月30日），〈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工作總報告〉，《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502-00001-001。

²⁶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工作總報告」（1954年10月30日），〈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工作總報告〉，《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502-00001-002。

²⁷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兼主任委員陳誠致詞」（1951年1月16日），〈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會議資料彙輯（一）〉，《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502-00002-004；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02、605、608。

注重事實，配合軍事要務。」²⁸ 7月2日，即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指出設計委員會的職責有二：一是研訂反攻大陸時期各種設計方案；二是研訂恢復大陸秩序以後的各種設計方案。而其目的就是「使軍政效率提高至最高度，以加速反攻軍事發展，提早建國工作的完成。使人民早解倒懸，得享和平自由的福祉，且可使國家亦得早進於建設復興的坦途」。²⁹

在蔣中正殷殷期盼及陳誠直接率領下，設計委員會各小組積極研擬議案，且頻繁開會討論；再視議案審查之需，交由委員大會討論通過；或者陳誠也會提出一些重要議題，例如警政、教育等項目，交由設計委員會提出改進方案，並嚴密追蹤設計成果。³⁰ 統計其主持設計委員會期間，共舉行過9次全體委員會議和1,349次的小組委員會議或分組會議。³¹ 每到全體委員會議，陳誠多親臨主持、參與討論並作講評，期許議案經系統整理後，作為部會施政或將來實施之參考。如1951年12月22日的第四次大會，討論「收復大陸初期成人及在校學生再教育案」，陳誠講評時說：不肯附共、不肯投機，卻被迫留在大陸或留在大陸決心與中共搏鬥者人數很多，所以「再教育」三字實有考慮必要。最後他析論稱：「我們不可認為大陸人民都被匪化，不可救藥，而要反躬自問，引咎自責，千萬不可戴起有色眼鏡去看大陸同胞。」³² 又如1953年12月4、5日第八次委員會，討論反攻時期貨幣計畫大綱、收復大陸時期重建鄉鎮城市綱要等六項議題，陳誠亦全程參與，主持閉幕時，分別指陳各案得失或修正補充意見，並明確指示議案是否整理報院的決議。³³

自從成立開始，設計委員會可謂發展迅速，如委員人數一路增加，據王雲五回憶，他於1951年元月抵臺，陳誠即致函邀宴，並聘為設計委員，當時委員數

²⁸ 《蔣介石日記》，1952年6月30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²⁹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會議重要參考文件」（1953年6月），〈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會議重要參考文件〉，《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502-00005-001。

³⁰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39、646、715。

³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230。

³² 「對大陸人心動向的分析—於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第四次大會對收復大陸初期成人及在校生再教育案討論後講」（1951年12月22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3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3-031。

³³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813-814。

還不滿200人，後來逐漸擴充至3、400人。³⁴ 各分組委員會也不斷提出針對反攻議題的各項設計方案。³⁵ 茲以軍事小組為例，共研擬11項方案，其中「國防建設綱要」先由小組多次討論後，交由第五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1952年6月10日報行政院核議，陳誠又指示：「本案送到會後，本席以兼主任委員身分，曾詳細看過，覺得其中待研究之處甚多。」提出三點仍待斟酌之意見後，決定將該案送行政院重行研究。³⁶

總之，設計委員會從成立到委員的聘任，陳誠均費盡心力，也參與會議的運作，對於各項設計方案成果均仔細審閱，隨即再指示繼續研討或發交行政院各部門作為施政的參考。因此至1954年5月15日，即將交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誠又召開了一次由全體設計委員出席之座談會，對設計委員們熱誠投入、完成復國建國方案81件表示肯定，也希望委員繼續研討尚未完成之各項方案，以竟全功。³⁷

三、出席軍事會談

擔任行政院長之後，陳誠開始參與由蔣中正親自主持，和反攻軍事準備相關，國防部首長及所屬各總司令均出席的軍事會談。1950年8月12日，他首次出席軍事會談，即表示日後如非政務羈身，會儘量出席，在會談中也常針對行政院等相關業務發言。茲舉數例：

例如1951年2月10日，因預算外軍費甚鉅，支付困難，陳誠在會談中報告云：「本年度財政情形已較去年為佳，惟困難仍多。行政院權衡緩急，分別支付，決不致有款不發，各單位不值輕信無謂謠言，引起誤會。」隨後的行政院院會中，對此事又詳加說明，云：「防空經費一億七千萬元，數字太大，本席曾就此事面報總統，奉總統指示，限於一千萬元內計畫辦理。每每有人批評，某種

³⁴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節譯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99-200。

³⁵ 孫宅巍，《陳誠晚年》（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83。

³⁶ 「兼主任委員對國防建設綱要草案之結論」（1954年8月），〈行政院設計委員會設計草案（一）〉，《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502-00102-022。

³⁷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862。

計畫甚周詳，祇是行政院不給錢，此種說法殊欠正確。決定一項計畫時，便應顧到政府有無財源，不可閉門造車，空中樓閣，做不到亦是徒然。今年剛過四十餘日，軍政費小組懸而未決案子，已達新臺幣三億多。雖然財政狀況較為好轉，但仍不能稍事怠忽，今年一定要比去年更謹慎、更撙節。」³⁸ 顯示陳誠對國家財政預算支出的嚴加控管，而與蔣藉由軍事會談，達成軍費支出平衡的默契。

同年6月30日的軍事會談，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提議編併國軍部隊，陳誠認為部隊歷史觀念不容易打破，如能將現有部隊都加以充實最為理想，但又須顧慮財力負擔。蔡斯所提辦法雖正確，惟在臺部隊已由40多個軍縮編成現有之12個軍，是否再須編併2個軍，值得研究。又針對逃兵，陳誠表示處理逃兵問題，應按月列表公布，並查明逃亡原因。屬軍事本身者，由國防部研究改善；有關政治方面者，由行政院解決。逃兵願被禁閉，不願回部隊問題，軍法機關應研究辦理。³⁹ 7月7日軍事會談仍繼續討論部隊編併問題，9日，陳誠受命召集軍事首長，會商陸軍改編問題，決定：1.原則接受蔡斯建議；2.改編範圍將以金門、馬祖的2個軍7個師除開為有利。因為如此臺澎的10個軍含直屬部隊可以保留，最多只裁11個師。⁴⁰

又如徵訓國民兵案，針對國防部擬具的30萬國民兵儲訓計畫，陳誠考慮：1.經常增加30萬人經費；2.召訓人員過多，恐影響生產，乃於1951年3月10日的軍事會談，表示因「經費困難，請總統考慮，俟財源有著後稍緩再辦，詳情擬專案呈擬」，經核定暫緩實施；至5月19日軍事會談，陳誠又針對包括儲訓10至15萬國民兵和擴增政工人員在內的軍事動員計畫——萬象計畫報告云：「前奉命召集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研究『萬象計畫』已經開會，多數主張應在政府可能擔負範圍內，以決定軍方必須之最低限度兵力。因臺灣鞏固，始可為反攻大陸之支撐。」並表示已由副院長張厲生成立審查小組研究審核，俟研究獲有成果，再行報告。⁴¹ 會議經張厲生於29日召集舉行，對於會議紀錄，陳誠指示：1.國民兵儲

³⁸ 「總統府軍事會談紀錄」（1951年2月10日），〈一般資料—軍事會談記錄（一）〉，《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599-001。

³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44、647。

⁴⁰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49。

⁴¹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637。

訓開始時可由小規模每次3千或5千實施之；2.儲訓之30萬國民兵，除備補編制缺額外，將來登陸前擴編部隊所需之兵員亦包括在內；3.政工人員之工作在軍隊與軍民之聯繫，而地方行政人員必須另行準備。⁴² 由陳誠對萬象計畫的意見及處理方式看，他對此時反攻軍事動員影響國家財政民生甚為疑慮，也利用軍事會談，和蔣或軍方人員取得共識。

又如1952年3月8日的軍事會談，討論國防組織法、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職權劃分問題，陳誠發言云：「一、問題是在預算，總統曾指示，且美顧問團亦有建議，軍事預算應歸國防部負責，財務可歸聯勤總司令負責。二、被服兵工各廠隸屬國防部，並非海陸空軍所有各廠均直接由國防部指揮，而是要由國防部負責控制、監督與考核，但本案應先將陸海空軍與聯勤權責先有所規定。三、預算一定要有控制，聯勤總部對陸軍方面的補給事項如已實施，亦應逐次達到海空軍。又海空軍其他方面應歸聯勤總部管轄者，亦應劃歸聯勤總部，使其真能成為三軍聯勤。」⁴³ 另外，針對美軍顧問團在軍制的建議、部隊改編問題或者美援中經援配合軍援等問題，陳誠也都在軍事會談中提出中肯建議及客觀解決方案。

綜如上述，第一任行政院長任期中的陳誠，與總統蔣中正同樣強調反攻大陸作為中心任務，也積極宣揚政府反攻大陸的目標，不管在行政院の施政計畫、主持設計委員會，或參與軍事會談，均以全副精神參與反攻大陸計畫方案之討論與研擬，期望早日反攻大陸，達成「反攻內閣」的理想毫無疑義，惟終因反攻時機未到，僅能目標高懸，穩步前進。

叁、反攻方案之研議

因為陳誠在行政院長任內任勞任怨，且較無官僚政客習氣，蔣中正決定提其為副總統候選人。⁴⁴ 1954年3月24日，陳誠當選第二任副總統，由俞鴻鈞繼任行

⁴² 「萬象計畫審查會議紀錄」（1951年5月29日），〈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七）〉，《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0-001。

⁴³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704。

⁴⁴ 《蔣介石日記》，1954年2月15日。

政院長。陳誠雖自云「余服務行政院四年餘，遂獲暫息仔肩」，但在副總統任內，加在肩上的重任卻是有增無減，對此陳誠也在《六十自述》中嘆道：「自卸任行政院長後，本期暫息仔肩，不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革命實踐研究院、石門水庫諸務叢身，隕越堪虞。」惟有以埋頭苦幹自勵，期能「紓總統宵旰之憂」，「拯大陸沉淪之厄」。⁴⁵ 陳誠任副總統期間，為反攻大陸計畫之努力，茲分述如下：

一、主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陳誠於5月20日就任副總統之前，已辭行政院長，兼任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理當易人，但在蔣的心目中，陳誠仍為最佳人選，適值國民大會於選舉第二任總統、副總統期間決議：「建議政府於本次大會閉幕後，在總統府設置光復大陸設計研究性質之機構，延攬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俾得益宏獻替，籌策中興。」⁴⁶ 蔣遂決定將設計委員會移出行政院，改隸總統府，於1954年7月16日公布「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組織綱要」，並於同日聘請陳誠為主任委員。

陳誠以胡適、左舜生、曾寶蓀、徐傅霖、徐永昌為副主任委員，邱昌渭為秘書長，委員則包括所有出席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之國大代表與原來之設計委員和部會首長共1,883人，期望光復設計委員會能集中智慧，研擬方案，早日完成反攻大陸，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大計。

11月25日舉行成立大會，蔣中正親臨致詞，陳誠接著致詞云：「深感本會責任重大，任務艱鉅，今後當遵照總統訓示，與諸位先生共同努力，以報國家。」也闡明該會任務為「研究如何光復大陸，重建國家」，又提示在縱的方面，要研究收復大陸後的各種建設方案，要研究反攻大陸時的各種收復方案，更要研究加強動員、鞏固臺灣與瓦解敵人的各種方案。從橫的方面，要研究我們自身的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各方面的建設，更要研究敵人的一切措施與友方的各種情況。期望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設計研究出來的方案，能「切

⁴⁵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頁131。

⁴⁶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26-127。

合實際需要，產生重大影響」。⁴⁷換言之，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在規劃反攻大陸方案外，研擬建設復興基地臺灣亦為重要目標。⁴⁸

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眾多，又分成臺北、臺中、臺南3個研究區及內政、國際關係、軍事、財政等14組，每組每月舉行會議一次，綜合研究組每半年舉行會議一次，全體委員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按照程序進行議事尚屬容易，但統籌其間的責任卻十分龐雜，幸陳誠於行政院主持設計委員會時已形成一套有效的運作模式，但是仍作了一些改變，例如設置編審委員會，後來改稱修纂委員會，負責規劃各組之研究事宜，編擬各種方案。陳誠曾在編纂委員會的第六十八次會議上說：「編纂委員會這兩年來貢獻很大，每次大會及綜合組會議，各方面對我們皆有好評，這不是本人的貢獻，乃是大家的貢獻，編纂委員會是本會的中心，每次開會提出來的方案，都很完整，結論也很妥當，那麼多的方案，我只能看要點，而這些要點是你們所提供的。」⁴⁹

而各研究區和各小組召集人及起草執筆人也很重要，陳誠常定期或臨時舉行座談會，透過他們主導研擬各種方案，例如1957年3月2日，因蔣中正指示，施政計畫及總預算均應以反攻為目標，陳誠覺得反攻時機已日益逼近，遂臨時召集座談會，要求各小組早日研訂各省重建方案。⁵⁰30日，他又召集各區組之召集人及起草人，舉行聯合座談會，期望早日完成光復大陸國家重建綱領，作為研擬各省重建案的基礎。他表示此項綱領尚有22案未完成，希望各區組避免重複，分推委員起草，早日完成。⁵¹

⁴⁷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27；「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之任務」（1954年11月25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5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5-009。

⁴⁸ 楊善堯，〈最後的反攻軍事設計：蔣中正、陳誠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收入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年），頁486。

⁴⁹ 「如何研究設計光復大陸設計方案」（1954年11月23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5集〉，「編纂委員會工作的成就」（1956年8月23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6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5-008、008-010102-00026-017。

⁵⁰ 「如何研究設計光復大陸方案」（1957年3月2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5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5-008。

⁵¹ 「大陸光復國家重建綱領之研擬」（1957年3月30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7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7-008。

至1957年8月15日，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成立約兩年半，陳誠呈報蔣中正云：「幸於全體委員奮勵之下，按照年度工作計畫次第推進，勉達任務。除各區組委員對各類方案研究成果，業經隨時呈報鈞座核示外，謹將二年工作開展情形、全部計畫中已完成各類草案與尚待賡續進行之案目分呈。」計完成反攻前69案、反攻時54案，共123案，其餘尚在著手進行的為光復後的各省重建方案，將於下半年度利用各省各地區人士分別成立專題研究組，進行研擬。⁵² 除了顯示該會在陳誠主持下，卓然有成；也顯示藉由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運作，陳誠與蔣中正針對各項反攻方案有密切的聯繫或討論。

但對於研擬完成之方案的實用性如何，陳誠其實態度有所保留，他說：起草的內容，不一定能適合各委員的意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因此不免有各種批評。他也認為無論全會或各小組所擬的草案，都是供大家參考的，雖不能盡如理想，但在拋磚引玉之意義下，有了起草執筆人所草擬的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對研究工作的進行，幫助甚大。而研擬完成的方案，均係草案性質，並非定稿，其有不完備之處，希望大家補充、修改，以臻完備。⁵³

二、主持反攻督導會議

遷臺之初的東南沿海反攻游擊戰似乎成效有限，反攻熱潮也就日漸消退。但是，到了1956年情況開始有些變化，先是陳誠在2月24日記下：「備戰而不求戰，避戰而不畏戰。我國能反攻，則迅即反攻；不能反攻，則宜示國人以長期奮鬥之必要，不使海內外人士由怨望而失望。」⁵⁴ 蔣開始思考獨立反攻，在日記中具體提到「反攻開始時期預定為明年六月至十月之間，利用季風時節，共匪必較我作戰更為困難也」。⁵⁵ 年底，陳誠主持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大會典禮也說：「明

⁵² 「陳誠呈蔣中正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二年來工作」（1957年8月15日），〈動員及僑務〉，《蔣檔》，典藏號：002-080101-00031-004。

⁵³ 「加速完成研擬方案以配合反攻需要」（1957年3月2日），〈石叟叢書—言論第27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7-006。

⁵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801。

⁵⁵ 《蔣介石日記》，1956年12月14日。

年將是我們的命運決定年，不是毛共打我們，便是我們打毛共，但國軍卻必定在明年期間反攻。」12月23日，他又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閉幕典禮說：「明年將是我們對共匪展開最艱苦鬥爭之一年，也是國家復興的轉捩點。」香港的《工商日報》就從他的言談中，嗅到反攻大陸即將發動的徵兆。⁵⁶

1957年果有加溫之勢，反攻大陸的準備步入一個高潮，蔣中正除了在日記中不斷宣示準備反攻、規劃反攻軍事外，為了減少美國的阻力，他甚至想到破釜沉舟，辭去總統一職，由陳誠接手；或者考慮主動提出取消中美協防條約，先取消其附件等方案，目的均在迫使美國不再阻止臺灣反攻。⁵⁷ 這一股反攻浪潮，陳誠亦有體察，不時地宣示積極反攻的必要性。

為推進反攻軍事，研擬妥善的反攻作業程序成為蔣中正此時思考的重心，1957年主持第一次軍事會談，討論設立「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委員會」。⁵⁸ 3月30日，首先在日記本星期預定課目記下「『作戰籌劃指導中心』之成立，與每週會報時間及其工作計畫與程序」。至4月10日間，持續思考研究督導中心運作模式與組成成員，確定名為反攻督導中心委員會議，副總統陳誠即被賦予此項新任務，為反攻行動付諸實施預作準備。⁵⁹

其實在此同時，蔣正在推動一項反攻計畫，名為中興計畫。這是根據1957年1月22日舉行的國軍軍事會議決議案，由國防部遴選曾受指揮參謀及聯合作戰訓練之優秀幹部組成反攻軍總部聯合參謀組織，負責反攻作戰計畫之擬訂與各項整備工作之研擬。而國防部也經呈奉蔣圈選出其中30名，於5月16日成立中興計畫作業室。⁶⁰ 根據計畫重要成員邢祖瑗回憶，中興計畫室成立不久，蔣指定陳誠組

⁵⁶ 〈社論：聞我有於明年反攻說—提請政府考慮幾點問題〉、〈社論：論反攻的時機—讀了陳副總統演詞後〉，《工商日報》，香港，1956年12月19日、1956年12月26日，版2。

⁵⁷ 《蔣介石日記》，1957年8月25日、9月10日、9月11日。

⁵⁸ 張世瑛，〈蔣中正與遷臺後軍事最高決策機構的運作：以總統府軍事會談為中心〉，收入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臺灣》，頁417。

⁵⁹ 《蔣介石日記》，1957年3月30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3月31日及「上月反省錄」、4月6日「上星期反省錄」及「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4月10日。

⁶⁰ 「國防部中興計畫作業室之組成及作業進度概況報告」（1957年），〈作業計畫及設防（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4。

成督導小組，計畫室所有作業均由曹永湘向陳誠簡報。⁶¹ 由於兩者時間接近，又均為蔣中正下令進行，並與反攻軍事計畫相關，其間的關聯性如何？令人好奇。

關於陳誠主持反攻督導會議情形，筆者於《陳誠文物》找到一份〈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按：從1957年4月13日至隔年4月12日，共舉行16次會議〕，分成討論指示事項與結論兩欄，雖非正式會議紀錄，但內容尚稱詳盡。會議正式名稱為「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在幕僚所記的〈陳誠日誌〉（以下簡稱〈日誌〉）中簡稱為軍事會談或軍事指導會議。

該份摘鈔並無出席與列席名單，但根據4月13日〈日誌〉，下午7時，陳誠曾邀集國防會議秘書長周至柔、副參謀總長羅列、余伯泉、國防部長俞大維、參軍長黃杰、參謀總長彭孟緝、空軍總司令王叔銘、衛戍總司令黃鎮球等軍事大員召開座談會。⁶² 推測座談會可能即為第一次會議，而參加者或為會議的重要成員。這些名單亦曾經歷變動，例如：7月8日劉廉一與唐守治即奉蔣之命加入委員會中。⁶³ 足見蔣對會議重視的程度。

在第一次會議中，也討論日後會議的時間、地點，決定於每週六上午9時30分，在總統府的副總統辦公室開會。⁶⁴ 但檢視各次會議時間，除了第二、三次尚依此原則外，其餘各次雖然仍在週末蔣主持的軍事會談前舉行，但並非每週舉行，直到1958年的元月4日和4月12日還舉行最後的兩次會議。完整的16次反攻督導會議摘鈔，顯示許多關於反攻軍事之準備事項均經熱烈討論評估，並提出較為妥善的方案，茲歸納如下：

（一）反攻時機：提出反攻最佳時機為：1.配合國際有利情勢；2.乘大陸內

⁶¹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54。

⁶² 「副總統陳誠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份日誌」（1957年4月13日），〈陳誠日誌—民國四十六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18-004。

⁶³ 「蔣中正令王叔銘可令唐守治劉廉一參加反攻督導中心委員工作」（1957年7月8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六年〉，《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353-060。

⁶⁴ 「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委員會會議指示摘鈔—第一次會議」（1957年4月14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3。

部之動亂；3.於匪軍進犯後即予擊敗，然後乘機反攻登陸。希望從速完成戰備，隨時掌握機會，實施反攻；並確定將於1958年5月至10月間發動，其中以秋季發動較為妥適，因為屆時可取用當地糧食，減輕運輸補給糧食之困難。⁶⁵

（二）強調獨立反攻精神：以獨立反攻為計畫準備之主要任務，並要求擬訂應急作戰計畫，以策應敵後抗暴。惟仍認為與美方有協調的必要。⁶⁶

（三）軍力整備：主張現有各師在反攻前必須進行充員，以攜用全部裝備，充實戰力，倘能將各預備師也裝訓完成，亦可以一部用於前方，代替正規師，希望前方作戰必須達到21個師的兵力。⁶⁷

（四）運輸事宜：反攻需要船隻裝載運輸，但將來由臺出航，只可能達到一個軍的運輸能力，故應以金門和澎湖兩處作為反攻前進基地。對於小型舟艇，例如機漁船、運輸船、碼頭等均須事先進行整備，而對船隻整備之優先順序為：1.修理；2.改裝；3.爭取美援；4.購製。⁶⁸

（五）戰地政務：決議在反攻作戰時，由各級軍隊政工單位辦理，以後則隨著戰事進展，將後方地區的戰地政務工作，逐漸移交行政部門接管。因此戰地政務各級幹部的訓練與儲備計畫，也應先著手辦理。⁶⁹

（六）反攻路線：決定第一優先目標為廈門；第二優先目標為汕頭。亦論及

⁶⁵ 「第一次會議」（1957年4月14日）、「第五次會議」（1957年6月8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3、008-010109-00006-077。

⁶⁶ 「第一次會議」（1957年4月14日）、「第十次會議」（1957年8月24日）、「第十二次會議」（1957年9月14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3、008-010109-00006-082、008-010109-00006-084。

⁶⁷ 「第二次會議」（1957年4月20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6。

⁶⁸ 「第二次會議」（1957年4月20日）、「第四次會議」（1957年5月11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4、008-010109-00006-076。

⁶⁹ 「第四次會議」（1957年4月20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76。

是否登陸東山島，策應登陸廈、汕之國軍等。⁷⁰

上述各點均與中興計畫內容一致，兩者關係之緊密毋庸置疑，經與《蔣檔》「中興計畫作業室之組成及作業進度概況報告書」作比對後，筆者發現兩者關係為：先由中興作業計畫室研擬「反攻軍事戰略判斷」、「反攻作戰準備總綱」作為討論要點，再擬出「反攻準備作戰重要事項」，由蔣修正核定為獨立反攻作戰、反攻作戰構想、反攻作戰總兵力、反攻準備總綱等18項，並另訂定完成時間表，送至陳誠主持的反攻督導會議討論。

中興計畫關於反攻計畫作業進度云：「配合全般之作業進度，逐一提請督導中心委員會審議與研討，截至九月十五日已召開會議十二次。」⁷¹又附了蔣於9月21日作戰會談對攻略廈門各案的指示。⁷²由此也證明陳誠的反攻督導會議是負責中興計畫作業室所提出關於18案之審核與研討。⁷³而這個會議到9月15日止，確已召開12次。9月14日第十二次會議，陳誠指示將攻略廈門各案計畫大綱報請總統核訂。⁷⁴不過所稱21日作戰會談，根據陳誠〈日誌〉，仍稱軍事指導會議，並註明由總統主持。⁷⁵另據蔣的日記，亦稱其「主持反攻督導中心會議」，會中指示：1.第一次登陸使用兵力，首須考慮船舶運輸能力；2.應以弱擊強、以寡擊眾，以免遭致重大損失；3.獨立作戰須考慮美國態度；4.應實施游擊戰法；5.避免攻堅，可先襲擊東山島，再俟機攻廈；6.攻略廈門之要領；7.攻略廈門究先攻

⁷⁰ 「第九次會議」（1957年8月17日）、「第十二次會議」（1957年9月14日）、「第十五次會議」（1958年1月4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81、008-010109-00006-084、008-010109-00006-087。

⁷¹ 「國防部中興計畫作業室之組成及作業進度概況報告」（1957年），〈作戰計畫及設防（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2。

⁷² 「附錄：總統於九月二十一日作戰會談中指示事項」（1957年9月21日），〈作戰計畫及設防（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2。

⁷³ 「國防部中興計畫作業室對反攻作戰準備重要事項之作業及研討進度報告表」（1957年9月），〈作戰計畫及設防（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2。

⁷⁴ 「四十六年第十二次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委員會會議」（1957年9月14日），〈石叻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84。

⁷⁵ 「副總統陳誠民國四十六年九月份日誌」（1957年9月21日），〈陳誠日誌—民國四十六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18-009。

汕頭或攻擊廈門兩案應再詳密研商；8.如攻廈不得手時之策略；9.避免以極大犧牲，攻占一城一地；10.準備在灘頭陣地自力自給，支持三個月。⁷⁶ 蔣在日記中並對督導會議提出的成果表示滿意，云：「對於戰略開始階段要領行動之詳加指示，甚歡，過去對廈門直接攻堅計畫不學無術之意見，可憐。」⁷⁷

綜合上述，顯示陳誠領導的反攻督導中心會議實為中興計畫作業室的督導審議機構，協助中興計畫之擬訂，而蔣亦在計畫的策劃指導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計畫雖經一套極為縝密的流程進行研討，但花費心力研擬出的初步成果卻因美國對反攻阻力仍大，加上考量中共局勢尚未極度惡化，最終遭到擱置，甚為可惜，但這項計畫仍具有很高的價值，例如強調擴建特種作戰部隊，發展敵後游擊武力，成為武漢計畫的重點；由攻廈展開登陸反攻，也成為1961年國光計畫擬訂過程中的重要參考。⁷⁸

三、革命實踐研究院與軍事會談之反攻言論

陳誠擔任副總統後，與蔣中正互動更為頻繁，他參加蔣所主持的一般會談、情報會談、軍事會談甚至作戰會談，或陪同蔣中正，或者代蔣參與更多軍事活動，如參加各項軍事演習、接見軍事將領，在軍事會談中也更加活躍。而他在1955年2月又接替張羣，出任蔣中正在陽明山所創辦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一職，投入不少心力在院務推動上，與受訓的黨政軍要員都有緊密的接觸。⁷⁹

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陳誠在原有課程之外，增加「參觀」與「檢討」兩課目及「院外輔導」，使課程訓練更加完備，既重理論，也重實踐，並期望學員研討

⁷⁶ 「附錄：總統於九月二十一日作戰會談中指示事項」（1957年9月21日），〈作戰計畫及設防（三）〉，《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9-002。

⁷⁷ 《蔣介石日記》，1957年9月21日。

⁷⁸ 1961年3月5日，蔣中正因思考反攻而翻閱其1957年日記，記下：「摘取反攻大陸與美交涉方針之各種計畫最有意義，是四年前所準備之意圖，至今方得其用，甚感時間與事業關係之重要矣。」參見《蔣介石日記》，1961年3月5日。

⁷⁹ 「蔣中正特派陳誠接任准張羣辭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1961年2月8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四）〉，《蔣檔》，典藏號：002-010400-00024-026；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28。

得失，作為擬定方案之參考。⁸⁰ 針對反攻計畫，陳誠也對研究員發表許多演講，如1955年4月11日，他告訴研究員反攻時機已經快到了，因為院長蔣中正說反攻最好的時機，就是匪來進犯我們，給他一個殲滅戰，乘這個機會就去反攻。他也提醒研究員，雖然我們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是中共也會來攻，我們希望他快一點來，所以應該更積極的準備作戰，不要鬆懈，且要進一步研究共軍來攻時黨政軍如何配合。⁸¹

又如1957年7月30日，他對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同學各期聯絡人講反攻大陸後的各種政策的研究，提到他發現一般人對反攻大陸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對反攻大陸非常關切，不論在臺灣在海外，大部分人都是如此；一種是相反的，認為現在不該叫做反攻大陸，老是叫反攻而不能反攻，會影響民心士氣，而且美國人也最不受聽。不但如此，既然一時不能反攻，應該減輕軍隊的負擔，解決大家的生活問題。陳誠表示他同意蔣的意見，反攻大陸最好要配合大陸抗暴運動興起，才是最大的一個力量。他覺得客觀的反攻條件日漸成熟，因此在主觀方面，要研究如何加強本身的力量，不能再吵吵鬧鬧，浪費時間和精神。

學員經過極嚴格的訓練後，蔣、陳皆期望他們日後能效力於反共復國的革命大業，1957年4月22日，蔣指示陳誠，將各期學員資料進行整理統計，而最重要的是擬議他們在反攻時期可擔任之職責及地點。⁸² 陳誠也認為透過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研訓，使研究員原先的「派系觀念、本位主義悉無形消除，朝乾夕惕，氣象一新」，承繼過去的廬山訓練、重慶訓練，「今日之陽明山訓練承先啟後，已奠下反攻復國之基石」。⁸³

至於軍事會談，陳誠也有許多指示，根據他所留下的〈副總統在軍事會談重要發言摘抄〉，記下從1954年9月至1963年12月在軍事會談中的重要發言，略述

⁸⁰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29。

⁸¹ 「匪來進犯就是我們反攻最好的時機—對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五期研究員講」（1955年4月11日），〈石叻叢書—言論第25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25-016。

⁸² 「蔣中正指示陳誠擬訂革命實踐研究院學員反攻時期擬任職責及地點」（1957年4月22日），〈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七）〉，《蔣檔》，典藏號：002-010400-00027-047。

⁸³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29。

幾項他的反攻計畫意見：

（一）1954年第二十八次軍事會談，對中共向金門砲擊，陳誠表示「我應繼續予以還擊，今日局勢，匪來犯我，匪陷於錯誤；我如不予還擊，我亦陷於錯誤」，申明「我今日不必說反攻，但應採以攻為守之原則」。⁸⁴

（二）1955年第二十次軍事會談，陳誠認為由參加石門水庫兵工築路工程的退伍官兵體能看來，許多退役官兵情況均佳，建議視各人身體條件，將退除役年齡考慮延長。如身體健壯，而仍志願從軍者，可延長退役年齡，因為這些有作戰經驗之老兵，在作戰時強過新兵，可以對新兵起領導作用，並且可補現在兵源之缺乏。⁸⁵

（三）1955年第二十九次軍事會談，陳誠提到要塞存廢問題，認為以防守立場言實屬需要，暫似不宜撤銷；對補充兵之訓練，意義甚為重大，但目前因僅4個月的訓練時間，事實未能改變其習慣，且增加負擔，不能達到訓練之目的，如能使其參加預備師或後備部隊訓練，更有意義。⁸⁶

（四）1956年第三十四次軍事會談，針對美國安全總署派員來臺訪問，批評國軍軍費支出甚鉅，將造成財政危機，建議縮編軍隊，陳誠答以：「國軍軍隊數量之多寡，應以將來匪軍攻臺之軍隊數量為標準，我國亦主張精兵主義，並極不願增加美國之負擔，惟我國力所不及者，仍須美方予以援助。」並獲得之美方同意。⁸⁷

⁸⁴ 「四十三年第二十八次軍事會談」（1954年10月28日），〈石叟叢書續編—軍事會談發言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05。

⁸⁵ 「四十四年第二十次軍事會談」（1955年7月9日），〈石叟叢書續編—軍事會談發言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10。

⁸⁶ 「四十四年第二十九次軍事會談」（1955年10月1日），〈石叟叢書續編—軍事會談發言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14。

⁸⁷ 「四十五年第三十四次軍事會談」（1956年12月22日），〈石叟叢書續編—軍事會談發言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27。

肆、草山爭論與反攻備戰計畫之推進

1958年7月，行政院長俞鴻鈞因監察院彈劾風潮請辭，陳誠依然是蔣中正心目中接任閣揆的最適當人選，陳誠深知閣揆角色難免與總統意見不同，亦深切了解此番上任，必定面臨許多財政難題，而解決全國所切望的反攻大陸問題更大，百般推拒不成，只有以「跳火坑」精神接受任命。⁸⁸ 陳誠以副總統兼閣揆，又是國民黨的副總裁，權勢達於高峰，惟面對蔣中正積極展開的反攻大陸計畫，不可不謂任重道艱。

一、協助武漢計畫善後

接任閣揆之後，陳誠首先關注的是共軍犯臺問題，他提出備戰與疏散兩大主張。8月11日，蔣告訴陳誠，中共可能在9月半前後對臺採取軍事行動，須在一個月內完成準備，並籌撥軍費1億元。陳誠答覆，對軍費的緊急支付已有準備，已令財政部長嚴家淦注意。亦再於14日和嚴家淦與經濟部長楊繼曾檢討財經問題，同時也研究戰備費之籌劃工作。⁸⁹

八二三金門砲戰果然隨即爆發，陳誠認為「我對金馬不能繼續挨打，非予猛烈還擊不可」，遂於28日再度召見楊繼曾與嚴家淦，商談戰時經濟財政，提議籌集臨時戰費，預定以8億元為目標，並指示戰時經濟應注意物資之重分與生產之加強。⁹⁰ 雖然期望共軍由砲戰而空戰再至登陸，至共軍兩棲登陸金門時，國軍最好利用機會發動擴大戰爭，但終因美方禁止國軍趁機發動反攻而無成。當時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還建議應趁機宣布開始反攻，陳誠在此情況下，也只能委婉地解釋：「反共抗俄戰爭是長期性的」，不能憑一時意氣，「在政治上尚未至宣布開始反攻之適當時機」，大家只能盡責造成有利之「勢」，真正反攻還得配合國際形勢的發展。⁹¹

⁸⁸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頁896-900。

⁸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頁924。

⁹⁰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頁928-930。

⁹¹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

1958年7月，柳元麟來報其率領的緬北游擊隊反攻雲南，已攻入佛海、鎮越、瀾滄，此項消息令蔣中正雀躍，於是利用空降特種部隊支援緬北游擊隊，進行反攻之武漢計畫乃順勢推動。由特種部隊第一總隊長夏超率領1,200名特種部隊搭機，經泰境抵緬甸境內的孟帕遼機場，開始增援緬北游擊隊，準備開闢第二戰場，在西南邊區開始展開反攻軍事行動。⁹²

緬北戰役是武漢計畫重要的一環，也可說是遷臺後國軍參加海外反攻作戰規模最大的一次，然而根據筆者研究，除了武漢小組之外，參謀總長彭孟緝負責與蔣擬議計畫，選定計畫目標區；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則不僅肩負與美方交涉野龍計畫之責，也和武漢小組成員及緬北游擊隊多有頻繁的互動，至於陳誠，似乎沒有多少參與。⁹³

隨著武漢計畫各項反攻準備如箭在弦之際，中共與緬甸卻已先趁寮局動亂之機，以重勘中緬未定界為名，彼此結合，出動大軍，夾擊柳部，緬北戰役爆發，反攻計畫及戰況也為舉國所關注。在反攻大陸隨時準備實施的氛圍中，陳誠於1961年1月2日考慮年度施政計畫重點，云：「以光復大陸為目標，以軍事、外交、經建為重點，凡與此無關者，均應儘量少做，並考慮國際上與國內之重要問題，尤以目前寮國問題及臺省之選舉。」⁹⁴ 在1月5日的行政院院會中也指示：「今年各部會無論在觀念上、精神上、事實上均須有軍事行動，作在戰爭狀態之準備與努力；換一句話說，必須從事最壞的打算，才有好的希望，對於戰略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頁22。

⁹² 葉惠芬，〈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以「武漢計畫」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0期，頁167-181；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炯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年），頁168-169。

⁹³ 按「野龍計畫」原稱「天馬計畫」，係由蔣經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克萊恩進行磋商，計畫大要為運用經過特別訓練、能擔任情報蒐集及報告之任務人員經由空降，滲透中國各地，進行秘密工作，目的在獲得適時而具體之情報，或決定煽動、激發及控制大陸反共活動。見「野龍情報戰略計畫」（1960年10月10日），〈專案計畫—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等〉，《蔣經國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經國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032-004；葉惠芬，〈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以「武漢計畫」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0期，頁167-181。

⁹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1304。

資，應設法在可能範圍內儘量進口，對於糧食須即購足十萬噸。」⁹⁵顯然已有進行反攻準備的體認。

同時，陳誠也開始關注寮局和緬北游擊隊的前途，1月13日，接見彭孟緝、馬紀壯、賴名湯等人，指示對緬北游擊隊應注意：1.部隊本質；2.不可遙制。次日在軍事會談後見蔣，也向蔣建言對游擊隊之指導應予變更：1.從敵人方面壯大自己；2.絕對機動；3.利用邊界人民根本無國籍之觀念，樹立反共思想。這些意見顯與蔣有些分歧，陳誠認為游擊隊最重要的原則是求生存，所以要重視的是如何從敵人方面壯大力量，應避實擊虛，以大吃小之方法求發展。⁹⁶

在中共和緬甸大軍夾擊下，緬北游擊隊最後被迫撤離江拉，戰事迅速落幕，武漢計畫已難以為繼；加上2月15日，空軍一架P4Y四引擎運補機飛往泰緬邊境對游擊隊進行空投運補時，意外被緬空軍擊落，機上來自臺灣的大量美援裝備也遭緬甸政府擄獲，引發一場嚴重的外交風暴。⁹⁷三天後陳誠在軍事會談，從副參謀總長賴名湯報告中獲悉消息，同日也接見特戰部隊副司令曾力民，了解緬北游擊隊兩月來作戰經過，開始參與緬北游擊隊的處置問題。

雖然緬北游擊隊的撤退最後是由蔣經國與克萊恩（Ray S. Cline）達成協議，稱為「雷國（Ray-Kuo）計畫」，⁹⁸但事先的評估研議，陳誠也在蔣指派下，參與其間。19日，陳誠先與外交部長沈昌煥、參謀總長彭孟緝商討，指示：1.即發聲明稿；2.對美國表示合作；3.說明部隊來源係前不願撤退離去及由大陸不斷投奔自由者；4.緬誣我被其所俘武器來源，不能承認是由我方供給；5.部隊處理與寮國接洽，改為志願軍，餘撤退。⁹⁹24日連續兩日，陳誠分別召見賴名湯和沈昌煥，了解事件緣由。¹⁰⁰25日，蔣召集陳誠、張羣、沈昌煥、唐縱、彭孟

⁹⁵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06。

⁹⁶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10-1311。

⁹⁷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142；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訢的戰爭紀事》，頁172。

⁹⁸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07年），頁143。

⁹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28。

¹⁰⁰ 「副總統陳誠民國五十年二月份日誌」（1961年2月25日），〈陳誠日誌—民國五十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22-002；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

緝會談，因獲悉美方態度強硬，陳誠評論：1.我們弱點在不能保密，現亦無法在緬北建立基地；2.現游擊隊留在寮國，在國際上對我無利，決心撤回；3.美國利用反對我國人士，指陳我們弱點，分化中美關係，堪注意。最後蔣作成決議，決將游擊隊撤回，以後不再空投；也要美方諒解我國處境困難，因為無法命令反共者放下武器。¹⁰¹

武漢計畫終以緬北游擊隊失利而宣告結束，但蔣認為在大陸饑荒嚴重、人心盡失的情況下，反攻時機並未消退；對特種部隊表現也抱持肯定，相信他們在經歷實際戰場磨練後，更具戰爭經驗與實際戰力，因此特種作戰部隊依然是下一階段國光計畫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力；而蔣經國與克萊恩正在洽商中的野龍計畫也成為蔣爭取美方支援，完成反攻復國使命不可或缺的支撐力量。

二、主持陽明山會談

陽明山會談的前身是為團結各黨派而準備召開的反共救國會議，1953年5月7日，國民黨第七屆二中全會提議邀請各黨負責人籌商召開一項反共救國會議，以團結在野黨人士。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開始進行籌備，1954年1月18日，他召集各黨中央負責人與社會賢達舉辦座談會，策劃進行，但不久即因他辭卸行政院長，致反共救國會議不了了之。¹⁰²重兼閣揆後，立法院部分委員因而提議，希望他能兌現過去的承諾，並擔負起反攻的責任。¹⁰³

如上所述，在武漢計畫之後，蔣陸續擬訂許多有助反攻的軍事方案，也不斷地思考如何說服美國支持國軍反攻，反攻大陸計畫仍然如箭在弦。例如1961年2月18日的軍事會談，蔣首提反攻備戰計畫，他期望在3月底前完成反攻備戰準備，而陳誠也就國軍戰備檢討提出：1.渡海船隻問題：建議與交通部預作研究，租用外輪5萬噸；2.軍精民食問題：增購糧食，準備國軍登陸後供應軍精，或救濟大陸難民之用；3.登陸後所使用之幣制，宜早作準備；4.地方政府之組織應先

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28。

¹⁰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31。

¹⁰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頁778。

¹⁰³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頁1065。

行準備，福建、浙江、江西、廣東等省可先組織。¹⁰⁴ 3月10日的作戰會談，研究代名為「辛丑」的反攻作戰計畫；4月1日，國光作業室進駐臺北三峽的大埔營區，專責規劃反攻作戰。¹⁰⁵

反攻備戰計畫即將展開，尤須全國團結一致，但此時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和一些有心人士挑動省籍情結，均持續引發對臺灣前途的憂慮，為了促進海內外團結，加速反攻大陸的腳步，反共救國會議已刻不容緩。1961年3月8日，由陳誠領銜，加上張羣、谷正綱、陶希聖等組成「促進海內外反共愛國人士團結合作專案小組」，決定在不違背憲法精神與反共抗俄國策等基本原則下，召開海內外反共人士救國會議，定名為「陽明山會談」。¹⁰⁶ 3月13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陽明山會談分期召開。31日，會談之組織及以袁守謙為籌備處主任人選均已定案，獲蔣同意後籌備工作開始展開。¹⁰⁷

6月8日，陳誠指示袁守謙，對陽明山會談案須先召開五院院長交換意見後，再提行政院為妥。當晚隨即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張羣、五院院長、副院長計24人一起交換關於第一次會談名單等意見。¹⁰⁸ 9日，陳誠發表書面談話，提出會談要旨：1.商討反共復國大計，積極解救大陸同胞；2.加速復興基地的經濟發展，增進人民生活，充實反攻力量；3.加強海內外的團結，一致為復國建國而努力；4.交換對政府應興應革的意見，獲得更多的成績和更大的進步。¹⁰⁹ 從會談籌劃以來，陳誠積極投入各項準備，為會議的順利進行可謂費盡苦心。

7月1日，以財政經濟為討論主體的陽明山第一次會談召開，陳誠開宗明義的表示，會議主要目的是在商討反共復國大計。在政府官員的政務、軍事、經濟、

¹⁰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27；「五十年第四次軍事會談」（1961年2月18日），〈石叟叢書續編—軍事會談發言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66。

¹⁰⁵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訢的戰爭紀事》，頁175。

¹⁰⁶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37。

¹⁰⁷ 《蔣介石日記》，1961年3月13日；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47。

¹⁰⁸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39。

¹⁰⁹ 「書面談話邀國內外人士在陽明山會談」（1961年7月），〈石叟叢書續編—石叟言論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2-037。

外交等報告後，與會者亦舉行分組座談，分成經濟發展、財政金融、外匯貿易三組，進行較深入的研討。

根據報導，擔任會談主席的陳誠，在會談期間多坐鎮陽明山莊會場，在主席台上主持議事，只有分組的那天例外，卻仍未能充分休息，因為7日晨，他在陽明山官邸召集財經首長楊繼曾、嚴家淦、尹仲容、徐柏園、陶希聖等10餘人舉行黎明會報，討論的主題就是如何把與會人士提出的意見，擇其可行者，付諸實施，使會談發揮實質效果。¹¹⁰ 陳誠自己也在日記中說：「此次會談大體情形尚佳，然一禮拜以來相當吃力，因不能不以全副精神付之也。」¹¹¹ 蔣自籌備開始，就全權責成陳誠，參與並不多，但會議之後，他循例接見與會代表，對會議結果亦表滿意。¹¹²

7月7日，第一次會談結束，陳誠作綜合結論時，比擬為抗戰時的廬山會談，期望在反攻前夕舉行這個會談，同樣也能「發揮我們自己的力量，為建設臺灣，反攻大陸共同奮鬥，來達成復國建國的任務」。對代表所提財經金融問題或農工漁礦等改革意見，將交有關部門研究辦理，也強調這次會談的結束，即是政府行動的開始。最後他特別強調政府反攻復國的決心，將本著「在艱彌勁，遇阻不迴」的精神，堅決奮鬥到底。尤其現在大陸到處都是反共革命的火花，中共已至崩潰邊緣，「我們一旦配合大陸上反共革命的力量，一定可以摧毀匪偽政權」。¹¹³

7月15日，舉行財經措施研討會，針對陽明山會談的財經問題提出具體辦法，陳誠致詞嘉獎各部會的效率，又表示：1.我們財經目標在建設臺灣與反攻大陸，目前以此目標來衡量，自然尚有距離；2.此種任務自然很艱鉅，但應有非常時期之觀念；3.須有擇善固執精神，少講空洞理論，多做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事。最後又引唐代陸贄勸皇帝之語：「含宏聽納，是聖王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病。」對第一次陽明山會談成績，陳誠深表滿意。

¹¹⁰ 〈陽明山會談第六天〉，《聯合報》，臺北，1961年7月7日，版3。

¹¹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91。

¹¹² 《蔣介石日記》，1961年7月6日、7月8日「上星期反省錄」。

¹¹³ 「陽明山第一次會談綜合結論—主持陽明山第一次會談結束前講」（1961年7月7日），〈石叟叢書—言論第30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30-028。

距第一次陽明山會談約50天，8月25日，陳誠又繼續主持以文化、科學、教育問題為主題的第二次陽明山會談，雖經過第一次會談，他仍不敢輕忽，主持會談開幕，說明開會意義。會中除了聆聽各項報告及綜合或分組座談外，也曾召集陶希聖、黃季陸，研究談話會應注意事項，有時亦接見與會人士，交換意見。¹¹⁴至31日會談結束，他總結道：反攻大陸是政府無可旁貸的責任，因此也是海內外共同關切的問題，所以我們共同的信念為：1.如不反攻大陸，消滅中共統治，不但國家沒有前途，而且亞洲與整個世界的和平安全也要受到最嚴重的威脅；2.我們光復大陸的主要憑藉是海內外和大陸的人心；3.共匪的失敗是必然的，如何保證反攻後不再失敗是每一位同胞認清我們共同的命運與共同責任。最後會談並通過促請政府早日反攻大陸，拯救同胞。¹¹⁵

經過兩次的陽明山會談，陳誠認為「參加會談人士，坦誠交換有關復國建國意見，對於促進政府與民間，海內外人士的相互了解，尤有重大作用。兩次會談表達了海內外愛國同胞一致的希望，就是督促政府，早日反攻大陸。我們深信全民的心意的歸向，就是我們反攻復國勝利的有力保證。會談對於政治、經濟和文教上興革的意見，政府從政同志正在分別擬訂辦法，依法定程序，付諸實施」。¹¹⁶由此顯示他對會議成果與影響深表滿意，希望藉由陽明山會談之舉行，獲得若干興革意見，一方面使海內外人士對政府觀感改變，相信政府有接納諍言、謀求團結，並力圖復興之誠意與決心。最終期望陽明山會談，必將形成團結與反攻的重要推動力。

¹¹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16-1418。

¹¹⁵ 「陽明山第二次會談綜合結論—主持陽明山第二次會談結束前講」（1961年8月31日），〈石叻叢書—言論第30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30-034；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18。

¹¹⁶ 「國內外情勢和我們的信念與努力—對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講」（1961年11月14日），〈石叻叢書—言論第30集〉，《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2-00030-037。

三、草山爭論

就在陳誠「相當吃力」，以「全副精神付之」的陽明山第一次會談舉行的同時，蔣中正迫不及待地提出8月反攻時程。雖然從本年初蔣已將備戰問題排入議程，尤其4月28日約見陳誠時，提出「反攻軍事行動開始之時期與軍事戰略之大意，並令其切實準備財政與金融之策劃，及自力更生，不可依賴美援之道」。¹¹⁷當時陳誠答覆：

我決可反攻，預定八月間開始，惟對經濟及國際間困難甚多。余研究以為匪陸海軍情形與總統所說大體相同，惟空軍因我人數太少，至多祇能作兩次至三次會戰，對於經濟，須有半年至一年自己支持，絕不能望美國支持。時間八月，正在秋收，對我有利，因反攻時最大困難是民食，不能不預作準備。¹¹⁸

雖然在此陳誠提出空軍戰力不足及財經問題，但或許以為還有轉圜餘地，所以並未針對8月反攻提出他的意見。蔣也就認定陳誠即使以「空軍持續力量不足為慮」，但「余信必可先將匪空軍在第一仗中消滅其前後主力」，所以實施反攻「乃無問題也」。¹¹⁹

事實上，對蔣的指示陳誠確有積極的回應，5月1日他約交通部長沈怡、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和秘書長李國鼎，叮囑作「萬一有軍事行動之準備——交通船隻以及戰略物資」之儲備。也與國防部長俞大維交換反攻意見，俞表示在和蔣商談反攻時，已向蔣表達「如不能得美國之同意，絕不可行，我反攻大陸如無美國協助，斷難成功」的意見。¹²⁰4日，陳誠又約參謀總長彭孟緝與副總長賴名湯、馬紀壯等研究反攻軍事：1.三軍檢討戰力；2.人力動員：充員、會戰後補充、傷亡處理、俘虜處理；3.物力動員：糧秣被服、油彈、零件等，預定3個月內完成初

¹¹⁷ 《蔣介石日記》，1961年4月28日。

¹¹⁸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60；《蔣介石日記》，1961年4月28日。

¹¹⁹ 《蔣介石日記》，1961年4月28日。

¹²⁰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61。

步動員。¹²¹

戰時財政更是反攻備戰的一大重點，5月11日，陳誠指示財政部長嚴家淦擬出「戰時財政方案」；26日，他先與嚴家淦討論妥當，再由嚴向蔣報告：1.戰時財政力量之估計；2.當前財政實況分析；3.戰時財政籌措。陳誠補充說明：1.戰時財政必須與經濟及戰略配合研究，以目前估計，只可勉強支持半年，如一年即感極端困難；2.戰時行政體制極為重要，如照目前情形，絕無法達成戰時之需求，且在憲法上甚難獲一妥善辦法；3.登陸後之幣制雖已略有準備，但仍須考慮比值等問題。蔣最後指示：「對於行政體制從速研究，餘由汝等研究決定。關於估計方面，對非因戰時之破壞及大陸之救濟與各種破壞之修復，尚未計入。」¹²²

5月27日，馬紀壯向陳誠報告急需軍費，用途為：1.購傘，美金60萬；2.金門加砲兵掩體，臺幣1,300萬；3.由緬邊回臺之特種部隊擬編第四總隊，將配合兩棲作戰之需。¹²³ 6月22日，陳誠與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談到大陸鈔票問題，並續與尹仲容、楊繼曾、沈怡商談戰時經濟及交通的準備等問題。同日，彭孟緝亦來談戰備經費問題。¹²⁴

隨著各項反攻戰備經費明細討論和戰時財源規劃籌措逐一推進，陳誠發現財政需用之鉅與問題的錯綜複雜，實已超出想像，尤其6月30日，蔣中正派彭孟緝轉報反攻作戰準備應於8月初完成；作戰經費概算年需新臺幣25至30億，7月份約需3至4億；徵用船舶20萬噸，均應於8月初集中整備完妥。因評估後發現備戰費之龐大，實非國力所能支撐，雖然蔣8月反攻心意已決，但陳誠認為應據實向蔣反應。

他指示彭孟緝：「反攻作戰當然要隨時準備，關於預算船舶問題，固屬重要，但吾人所應考慮的問題尚多，如時機問題自然由總統決定。」但反攻實應有較完妥的準備，假如沒有勝算，不應貿然進行，因此，陳誠又提出一連串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各級將領之作戰指揮能力及信念是否確立？對於山地及複雜地形

¹²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63。

¹²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73。

¹²³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74。

¹²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84。

之作戰已否熟練？陸軍裝備如何改為攻勢作戰及山地作戰之裝備？空軍數量過少，持續力有限，能否掌握制空權？海軍輪力與小艇不足，如何補救？商船徵集高達20萬噸，如何保密並進行準備等。¹²⁵

陳誠又向彭孟緝解釋，渡海反攻危險實多，補救的方法是在觀念上，「將渡海作戰轉為渡江、渡河作戰」，所以應在外島多建倉庫，先行運儲，即可補救制空權與輪力不足問題。在美援糧食物資方面，「現在來臺之物資目前可維持半年之需，戰爭一開始，應有美國軍經援均將停止打算」，所以亦應籌謀美援停止後至少一年自力作戰之準備。

再針對作戰經費政府可籌措24億的問題，陳誠認為，雖然國庫有外匯6千萬美元，但欲動用須付出臺幣，且不能全部動用；而相對基金有10幾億，必要時可以動用，可是欲籌20幾億，受現行行政體制限制，其實十分困難。除此之外，人民心理與觀念因素或國際問題，均應全盤納入考量。最後，他表示：「時機自須慎重考慮，但是仗總是要打的，應該打。我們要研究如何打法，『孤注一擲』也要考慮如何擲法。」決定等考慮完妥後，再親自向蔣報告。¹²⁶

雖然陳誠準備親自向蔣報告，但彭孟緝已先將詳情向蔣回報，蔣頗不高興，當日日記即記下：「辭修對孟緝談話，表示其對我反攻復國計畫根本失卻了信仰心，殊出意料之外。彼在四月底已同意我所定開始反攻時期，且已決定戰時財經措施與軍費，而今日忽反前議，對我威信毫不顧及，可痛！」又說：「辭修對我反攻作戰計畫竟先同意，而最後出於反對，更令心神交困！可說此一周末，為內外刺激最深之一天也。」¹²⁷

7月2日，陽明山會談第二天一早，蔣立即約見陳誠，他為了彭孟緝的報告，已先私下動怒，所以一談及擬於8月開始反攻計畫行動一事，當陳誠力稱：「余以為反攻自當義無反顧，惟目前是否為反攻適當時機，應考慮。」蔣已難抑制憤

¹²⁵ 「關於反攻作戰準備工作」（1961年6月30日），〈石叟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89。

¹²⁶ 「關於反攻作戰準備工作」（1961年6月30日），〈石叟叢書續編—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6-089。

¹²⁷ 《蔣介石日記》，1961年6月30日、上月反省錄。

怒情緒，兩人有了一番不小的爭論。¹²⁸ 對於這次爭論，陳誠隨筆記下爭論的內容，云：

其責難可歸納為：一、責我破壞其統帥威信；二、責我阻撓其反攻大陸決策；三、對我數十年來之培植，表示失望，並說如果他不，請我幹。

又記下自己的答覆和感想，云：

一、我自知並自諒學問不夠、修養不足，但自信對反攻大陸之決心與準備決不後人，並時以古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與正義即權力的認識，對共匪鬥爭必須貫徹到底；二、我的缺點固極多極大，但決不忘記我的責任與做人的道理；三、如果對我的人格發生懷疑，我非但不能再任行政院長，即人也不能做，我的選擇寧做人，不願再做官；四、我之追隨總統初衷在實行國父三民主義，而非做官，尤其高官。我六十多歲了，近數十年來任勞任怨而且任謗，究竟為什麼？我如稍存自私之念，決不如此傻幹——不顧毀譽、不顧身體的幹。¹²⁹

草山爭論中，主持政務、熟悉政府財政狀況的陳誠認為反攻實力尚不充足、時機仍應再緩，但一再因反攻受阻，對反攻大陸愈形迫切的蔣則心意已決，兩人為了8月反攻，爆發巨大的分歧，蔣罕見地責難陳誠，至「其憤慨情形形於聲色，實為我追隨他近四十年來未見」之程度，最後因宋美齡聞聲出而勸止，又至陳家慰問，事件方告平息。¹³⁰

四、反攻備戰的開始與訪美之行

蔣陳之間的草山爭論平息，陳誠開始遵循蔣的「必須積極準備」，進行反攻大陸各項備戰工作。7月11日，先接見參謀總長彭孟緝與副總長馬紀壯，接著聽

¹²⁸ 《蔣介石日記》，1961年7月2日；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89。

¹²⁹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273。

¹³⁰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273。

取國防部備戰簡報，指示實行登陸行動仍須重行研究。¹³¹ 晚上，又召集嚴家淦、楊繼曾、徐柏園、尹仲容、沈昌煥等，研究備戰之財政、經濟、金融、交通等各項事宜。¹³²

經過草山爭論後，蔣中正對陳誠的態度極為留意，11日下午彭孟緝來見，談到他把軍事計畫與預算報告送達陳誠及陳誠指示情形，蔣聽後的感想是「大體上未曾如前之反對，但其仍有若干成見也」。蔣也留意到美軍顧問團對中華民國最近軍隊動態，似有「感覺我已從事於反攻軍事之準備，表示懷疑之象」的疑慮。¹³³

7月17日，因關於聯合國外蒙入會案的分歧，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及副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來函，向蔣要求派一信使赴美，在日月潭休養的蔣中正召來陳誠和沈昌煥，囑陳、沈兩人代表赴美，更提醒陳誠「特別注意反攻大陸——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必須修改，應告美方亞洲人民不反共即反美，韓國不出三月必極惡化」等，希望陳誠能爭取美國對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支持。另又交代一份供陳誠與美方的討論要點：1.美方禁止我一排以上兵力之突擊的自由，中美似有共同檢討之必要；2.野龍計畫空投人數必須在一排人以上，甚至是一連至三連以上兵力，同時作一次之空降；3.反攻大陸非僅為收復國土，乃以恢復人民自由生存，順應人民解除其饑餓奴役迫切之呼籲；4.政府將本一貫方針，與美國竭誠合作，以解決一切共同問題；5.請美方勿忽視亞洲反共形勢之需要，不能專為歐洲安全利益，而以犧牲亞洲反共活動為代價。¹³⁴ 從蔣的指示要點上看，突破美方對反攻軍事的束縛，甚至加強實踐野龍計畫，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更是蔣注意的焦點。

18日下午，從日月潭回到臺北，陳誠隨即約見彭孟緝和馬紀壯，指示：1.積

¹³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頁1392；「副總統陳誠五十年七月份日誌」（1961年7月），〈陳誠日誌—民國五十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22-007。

¹³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92。

¹³³ 《蔣介石日記》，1962年7月11日。

¹³⁴ 「副總統陳誠訪美有關我國軍事行動野龍計畫反攻大陸等會談資料」（1961年6月29日），〈蔣經國訪美期間電文暨報導及陳誠訪美會談資料〉，《蔣經國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16-019。

極準備，以演習掩護動員，即擬局部動員令；2.準備赴美事宜，注意對共軍部署及美軍在韓部署。¹³⁵ 19日，徐柏園交來大陸使用鈔票樣本。又展開一切赴美的準備工作，如邀約熟悉中共情勢的陳建中，希望他偕同赴美，並準備中共政經軍事情況等資料，要求副總長賴名湯準備大陸情勢資料，也於25日接見美國海軍通訊輔助中心主任克萊恩，詢問美方政情等。¹³⁶

7月29日，陳誠動身赴美，蔣中正親往送行，8月13日返臺。¹³⁷ 9月4日克萊恩來見，提到陳誠在美與甘迺迪會談時，曾說大陸有3、5萬幹部已與我方發生聯繫，甘頗感興趣，希望進一步詢問詳情。陳誠回答，這是由討論美國如何打擊中共而講起，甘迺迪先提古巴與匈牙利失敗之例，要吾人注意。陳誠因而對甘解釋我們國情不同，大陸有人內外配合，必不致失敗。克萊恩又提到華府方面鑒於大陸抗暴甚至中共有垮臺可能，知道我方的光復設計委員會籌劃多種方案，可否提供相關資料？陳誠告訴克萊恩：「關於大陸黨員之聯絡，可轉告主管供給資料；光復會資料可照給。」¹³⁸

原本訪美是為了化解與美方對外蒙入會案的分歧，但蔣的指示或陳誠的訪美準備，甚至訪美時的言談重心，顯然焦點都集中在爭取美方對反攻大陸的支持，希望美方能充分認識中共情勢之惡劣及中華民國對反攻大陸已有充分的準備等問題上。就此部分，陳誠對於他訪美的成果甚表滿意，云：「對美國國民影響或較其他為大，因此行可使美國人對於中華民國增加認識，及提高其反共意識，不無收穫，尤其對於僑胞對愛國反共之熱烈，甚為感動。」¹³⁹ 而這也難怪美方認為經過溝通後，臺美關係應有所改善，不解為何陳誠返國後，雙方關係非但沒改善，反而愈見惡劣的癥結。¹⁴⁰

蔣、陳認為美方應對臺灣的反攻行動能加以理解，反攻備戰行動持續進行，

¹³⁵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96。

¹³⁶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96-1399。

¹³⁷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396-1411。

¹³⁸ 「與美國克萊恩主任談話紀要」（1961年9月4日），〈石叻叢書續編—訪美專輯〉，《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8-017。

¹³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11。

¹⁴⁰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166。

9月6日晨，侍衛長胡炯送來蔣中正手諭，開列第一期戰備費，除已撥3億元外，尚需2億元，分為9月份5千萬，10月份7千萬，11月份8千萬。戰備費的籌措與備戰問題成為陳誠與財經官員努力的方向。該日中午，陳誠立即約嚴家淦和徐柏園商議，決定先撥9月份的5千萬元。¹⁴¹ 次日院會後，又約嚴、徐商撥戰備費，兩人都提到影響通貨與物價的嚴重性。9月21日，陳誠又分別接見尹仲容、周宏濤、徐柏園等，尹仲容強調稅收應予加強。

至於一些妨害反攻備戰進行的因素也必須排除，9月19日，陳誠約見憲政研討會秘書長唐縱、谷鳳翔、谷正綱等人，談到國民大會正在研議的創制複決兩權案問題，應以較簡單、避免枝節的增訂臨時條款方式解決。次日陳誠主持中常會，即決議先由三位秘書長分別召集其國大黨部委員及綜合會黨員加以說明：當此國際極度緊張之時，應以隨時備戰為目標，不可因修憲及兩權案，使內部不安，影響備戰。¹⁴²

惟此後為了外蒙入會案引發的中國代表權爭議，造成軒然大波，各方意見分歧，也讓蔣、陳只能集中心力，思考應付解決，10月14日，陳誠見蔣，表示對外蒙政策應從速決定，「因對內對外均須有準備，除為甘總統之關係外，維持中美友好，以做準備反攻，實無其他理由。因聯合國代表權固為一般人所重視，其實在我國應以反攻大陸第一，因此關係國家存亡也」。¹⁴³ 由此更凸顯陳誠一貫的將反攻大陸優先於中國代表權問題上。所以，當26日外蒙通過入聯案時，陳誠十分憤慨，認為是「聯合國歷史上最大之汙辱，此種惡例一開，我雖發表嚴正聲明，不承認偽蒙獨立國，我反攻後，對外蒙主權不受約束。然問題在『反攻』二字，今後祇有努力，從速反攻大陸，以雪此種恥辱」。¹⁴⁴

10月底，陳誠夫婦先後因病住院休養，病中的陳誠對一些重要訪客仍予接見，除了指示政務處理原則外，不忘提醒今後的方針在臺海安全與反攻大陸方面，人人均應有備戰之決心，以備戰為先，而政府應在預算問題和糧食政策等方

¹⁴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21。

¹⁴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28。

¹⁴³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38。

¹⁴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41。

面都預為準備。¹⁴⁵

五、國光計畫之進行

1961年底，蔣中正決將反攻備戰行動延到翌年3月中旬，對國光小組制定國光計畫及陳誠領銜的備戰計畫進度，均甚表滿意。¹⁴⁶ 1962年，大陸內部情勢仍然不穩，加上寮、越亂事有擴大之勢，反攻大陸再度排上議程，且有緊鑼密鼓之勢。元旦當天，蔣中正與夫人宋美齡來訪，和陳誠談到國際情勢，蔣認為今年國際間隨時均可能發生變亂，對反攻大陸有利。陳誠回答：「我以為去年一年最為危險，因甘政府缺乏經驗，並因古巴及越南，尤其對聯合國失去信心。有一年之經驗與教訓，今年或許較有信心，對於整個國際情形，亦增加了解，此對反共頗為有利。」¹⁴⁷

反攻時機確有進展，陳誠在新日記本中特別手錄1961年7月2日草山爭論時的感言：

反攻、反攻，必須忍耐、決心、勇敢，要待機造勢。機屬於客觀者多，勢則在主觀，機未熟，勉求不可，故必須忍耐；勢已成，欲罷不能，必須下決心，義無反顧。以抗戰言，張學良輩在時機未到以兵諫，使剿匪功虧一簣，造成今日之大禍；汪精衛之流，在七七事變後投降求和，均為千古罪人。吾人處今日之環境，祇有「忍」之一字，來埋頭準備，把握時機也。¹⁴⁸

其中「機未熟，勉求不可，故必須忍耐；勢已成，欲罷不能，必須下決心，義無反顧」一語，似為其對1961年至1962年關於反攻時機的最佳註解。

但新年度，陳誠一度想辭去行政院長兼職，仍為蔣所阻，只允其到南部靜養一個半月。離開臺北之前，先和副院長王雲五、秘書長陳雪屏商量年度預算問

¹⁴⁵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64-1467。

¹⁴⁶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炳的戰爭紀事》，頁188。

¹⁴⁷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80-1481。

¹⁴⁸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78。

題，決分收入和支出兩小組研究，收入方面王雲五提出是否以防衛捐名義加稅？陳誠表示反對，因過去對防衛捐開支不夠清楚，已引起社會上及立法院非議，目前不能再提。王又提及動用黃金問題，陳誠認為非至萬不得已時，不能動用。而關於支出，強調戰備費暫勿列入，才能使收支差距接近。¹⁴⁹對來報告備戰計畫情形及下年度軍費預算的彭孟緝、馬紀壯，陳誠也指示「一切以反攻為重點，希積極準備，並希注意下級幹部與士兵對高級機關不平的情形」，要求軍方應注意簡單樸實，不可鋪張。¹⁵⁰

1月14日，陳誠向蔣報告預算差額約20億，建議：1.戰備費暫不列入；2.必要時動用部分黃金。蔣詢可否使用緊急處分令，陳誠答以「無法令根據，非至反攻時不能用」。15日，陳誠即召開預算會談，獲致結論：1.戰備費不列入；2.各部會可照本年度預算為準，不得增加，而國防部事務費應酌減；3.差額不得過超5億。¹⁵¹處理完預算問題的次日，陳誠夫婦前往高雄澄清湖休養。

2月18日，蔣與夫人宋美齡到高雄，陳誠夫婦在岡山迎候，並同車前往澄清湖，車中談反攻大陸。次日，兩家人共度元宵，續談反攻事。20日，陳誠返回臺北。北上途中，與省主席周至柔等聚餐，席間亦談反攻準備，要求對省府建設分先後緩急，以免影響反攻。而且眾人的共識是一旦開始反攻，義無反顧，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均應用之於反攻。

回到臺北，陳誠感受到更強烈的反攻氛圍，當晚與張羣談反攻準備。21日，中央黨部秘書長唐縱來報告中常會情況，並談及反攻的準備與決心。陳誠也不敢懈怠，當即約王雲五與陳雪屏，談行政院月來情形及總預算與下年度施政方針，並商反攻準備。22日，陳誠又約彭孟緝、馬紀壯，談反攻準備與決心。

2月27日，陳雪屏交來蔣的手諭，謂：「自三月份起至七月份止，約須籌撥戰備費總數十億圓，三月份先撥一億五千萬圓可也。」陳誠請其回報蔣：「當即照辦。」¹⁵²次日，陳誠約見張羣、王雲五、嚴家淦、彭孟緝召開備戰小組會談，

¹⁴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84。

¹⁵⁰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84-1485。

¹⁵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486。

¹⁵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3。

強調：反攻必須造成勢，即全國均要反攻，而反攻並非某一個人之事，如此較有把握。如僅一二人有決心，恐費力大成功少。又何時反攻？應造成戰機，乘機行動。又關於人的動員，決不可借名欺騙人民，對於戰費應有項目，擇其急要者先撥，如用外匯，即不必發臺幣。¹⁵³

3月3日，陳誠與交通部長沈怡、次長費驊等研商交通運輸問題，準備向日本購買小型船隻。4日，對反攻準備作更周全的思考，如船隻、糧食、收復區人力、物力等相關的問題。與此同時，蔣也考量反攻步驟：「一、宣傳共匪即來進攻臺灣的消息。二、號召戰時生活的實施規章。三、對美協商援助計畫：甲、在美援下直接攻取廈門；乙、實行海熊、海虎計畫；丙、海龍計畫；丁、海蛟與海馬計畫。」¹⁵⁴ 6日上午約陶希聖，談反攻宣傳造勢，指示陶：「使全國同胞咸認為反攻大陸為救民之義舉，又對大陸同胞，可解救他、恕他、助他，但我軍政人員必須做到秋毫無犯。」下午見蔣，研商各項反攻軍政事項，陳誠除了報告3月份戰備費已辦妥外，又提出造勢、保密、積極準備、對美交涉、船隻、幣制、各省區負責人選等問題。¹⁵⁵

與蔣研商結束的3月8日是陳誠忙碌的一天，行政院院會前，先與嚴家淦確定3月份戰備費撥法，也與政務委員王世杰商談戰爭體制及配合等問題，院會中又決議組織物資動員委員會，會後與葉公超談反攻時，強調「應注意中美協防條約之換文，及如何運用美國會與我友善之議員工作」。再約陶希聖談反攻宣傳造勢，及預備與甘迺迪特使、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談話材料，希望使美方對我「非好戰求戰，而是應戰，但應戰必須主動」加以理解。下午，再約嚴家淦、楊繼曾、尹仲容、徐柏園、馬紀壯商談戰時的財政與經濟。¹⁵⁶

¹⁵³ 「副總統陳誠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份日誌」（1962年2月28日），〈陳誠日誌—民國五十一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23-002；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3。

¹⁵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4-1505；《蔣介石日記》，1962年3月4日。

¹⁵⁵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6。

¹⁵⁶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7。

3月10日陳誠主持中常會，由馬紀壯報告戰備費用途，會前會後，陳誠也分別召見香港《工商日報》總編輯胡秩五、中國國民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等人，分別研究本地和海外的宣傳造勢。下午，又舉行備戰小組會談，商決戰前、戰時及前後方財經如何配合軍事。¹⁵⁷

陳、蔣都盼望徵得美方同意，如前述陳誠向沈昌煥、陶希聖和葉公超分別諮詢，而蔣也通過克萊恩和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向甘迺迪表達希望展開對大陸的反攻軍事。但3月6日蔣卻得知莊萊德已被國務院召回，也獲悉哈里曼即將來臺，要求臺灣履行中美協防規定的消息。¹⁵⁸

3月14日，哈里曼抵臺，他按甘迺迪旨意，提出「中美1955年的換文」緊箍咒，又舉1961年美國在古巴豬灣事件新敗經驗為「僅賴希望而非現實，貿然行動的前車之鑑」，對野龍計畫也表示美國底限仍設定為20人規模的空降行動。¹⁵⁹陳誠先從沈劍虹處獲知，哈里曼與蔣單獨會談時對反攻大陸提議反應甚為冷淡，後亦參加晚宴和餐後的會談，得到「總統認為機不可失，哈認為須慎重；總統希望美國同意，哈希望中美共同研究，彼此同意」的結論。¹⁶⁰隨後克萊恩亦被召回，蔣又希望透過克萊恩與甘迺迪直接溝通，請其支持反攻大陸。但是由克萊恩攜回甘迺迪的七點計畫，要求反攻拖延半年，顯示甘此時並不贊成臺灣反攻大陸，甚至不支持反攻，而且撥臺的C-123型裝置反雷達之電子機兩架也延至10月1日先交一架。¹⁶¹

¹⁵⁷ 根據陳誠日記，本日首次出現「備戰小組」名稱，成員為王雲五、嚴家淦、楊繼曾、周至柔、陳慶瑜、馬紀壯、彭孟緝、梁序昭、陳雪屏、徐柏園等。另據該日「陳誠日誌」，還要加上黃占魁與尹仲容二人，又3月31日日誌，指備戰小組為張羣等14人，則張羣亦屬備戰小組成員。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8、1517；「副總統陳誠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份日誌」（1962年3月），〈陳誠日誌—民國五十一年〉，《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402-00021-003。

¹⁵⁸ 《蔣介石日記》，1962年3月6日。

¹⁵⁹ 關於蔣中正、陳誠等人與哈里曼會談紀錄，詳見「蔣中正總統與美國助理國務卿哈里曼第一次第二次會談記錄」（1961年3月14日），〈蔣中正與甘迺迪往來函件等〉，《蔣經國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02-007；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03；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頁203。

¹⁶⁰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10。

¹⁶¹ 《蔣介石日記》，1962年3月6日。

美方反對臺灣反攻的態度已趨明朗，國光計畫雖持續推動，但也轉趨低調。3月31日，陳誠見蔣詢問購船事宜，蔣指示照辦。備戰小組會談繼續召開，討論戰時財政及提前購買物資事。¹⁶² 4月7日，蔣又召集備戰小組進行備戰經費會談，決議加稅暫勿採用緊急處分令，而是由行政院提出特別預算，再送立法院審議。10日和17日的軍事會談，均檢討國光計畫。因為軍費支出龐大，如不增加收入，恐未待軍事發動，經濟已先動搖，陳誠決定提出國防臨時特別捐案。4月12日，他約嚴家淦等備戰小組成員，商討備戰計畫所需經費及準備規劃「國防臨時特別捐」，研議可能增加的收入，再按量入與量出之原則，確定急需支出項目及經費數額。同時也透過國民黨的中常會和邀宴行政院全體閣員加以洽商，並邀約立法院國民黨黨部重要成員尋求共識。

經過事先周密的研討，又進行與一系列相關單位或人員的周旋，27日陳誠到立法院報告，「國防臨時特別捐徵收條例」旋即在下午獲得立法院三讀通過，4月30日明令公布。該條例規定自5月1日起開徵國防臨時特別捐，至翌（1963）年6月30日止，預定在14個月之內，籌措到6千萬美元的額外歲收，支應反攻大陸的軍事開銷。¹⁶³ 但該條例一通過，立刻引發美方關注，5月2日，美國大使館代辦高立夫（Ralph N. Clough）奉美國務院訓令來訪陳誠，提及中華民國軍費的超額支出，恐影響經濟建設及大陸情況，實非必要，因為根據美國情報，此時並非反攻最有利時機，而最重要的是希望臺灣的軍事準備先與美方會商。陳誠答以：「一、經濟建設絕不中止，經濟基礎不容動搖；二、準備工作實屬必要，不然縱有機會，亦無法把握；三、兩國政府必須互信，舉凡可以報告之事自當坦誠相告。」¹⁶⁴

由於美方蓄意延遲國軍反攻，對國防特別捐徵收又反應迅速，蔣、陳擔心在軍事反攻未行動之前已先引發與美方感情惡化，影響美援，使本身經濟動搖，國光反攻計畫被迫繼續等待時機。陳誠雖仍關注與美方交涉進展，期望反攻情勢與時機的到來，但隨著美方一再明白干涉，陳誠只能無奈的嘆道：「一面固然要忍

¹⁶²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517。

¹⁶³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頁156。

¹⁶⁴ 「副總統五月二日接見高立夫代辦談話紀錄」（1962年5月2日），〈石叻叢書續編—談話錄〉，《陳誠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7-076。

氣；一面更要爭氣。一旦反攻開始，對於美國對我應作最壞打算，而力求自力更生，絕對要打破依賴心理。」¹⁶⁵

綜上所述，陳誠在副總統兼任閣揆期間，確實扛起了反攻軍事計畫準備實施之重責大任，例如為了凝聚全民意志，投入萬般心力於陽明山會談；卻為了軍費籌備困難，與蔣發生草山爭論，蒙受蔣的嚴厲斥責；為了解決外蒙入會案與美方的分歧，並爭取美國對反攻軍事的實質支持，親身赴美一行；為協調黨政軍各部門對反攻軍事之籌備，各司其職，主持備戰會談，折衝其間；在國家財力仍不足以支撐反攻軍事的情況下，開徵國防臨時特別捐，又得勉力維繫政府財政收支平衡，應付美方威脅停止美援，可謂任務艱鉅已極。但反攻大業依然受阻於美方，加上健康因素，1963年12月，陳誠終於獲准辭去行政院長一職，1965年3月5日，因肝癌病逝。

伍、結論

自政府遷臺以來，蔣中正即集中全力構思反攻大陸計畫，期望終能付諸實施，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在蔣中正的指揮下，以國防軍事整備為核心，舉行軍事會談或作戰會談，制定了各種反攻作戰的軍事計畫，但是軍事反攻計畫涉及許多複雜層面，限制很多，更何況無論蔣或陳誠，都認為除了軍事反攻之外，還有政治、文化、經濟等各種反攻，因此蔣也下令設置革命實踐研究院、設計委員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等，研訂與反攻相關的各種方案或培植反攻人才，形成更多人士參與、提振全國民心士氣，且更為完備的反攻計畫網絡。

根據筆者爬梳檔案史料，發現在蔣中正的反攻大陸全盤計畫中，軍政經歷豐富又做事嚴謹認真、績效卓著，屢獲蔣中正拔擢的陳誠，除了擔任兩任行政院長，施政計畫強調反攻大陸目標外，又分別出任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設計委員會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協調領導黨政軍各界知名人士齊心為國效力，設計更多、更龐雜的反攻方案，或主持以團結海內外，商討反共復國大計為

¹⁶⁵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頁1660。

標榜的陽明山會談，匯聚各界對政府的興革意見，宣揚政府反攻大陸決心。以今日來看，這些反攻方案或者對政府的各項改革建議之功用如何，可能引發不少質疑，但在不斷宣傳反攻大陸的年代裡，它們多少能發揮團結全國各界，齊一全民反共意志，維持政局穩定的功能。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即使在軍事反攻計畫部分，脫離軍職許久的陳誠，在1957年國防部中興計畫作業室制定中興反攻計畫的過程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蔣的指示下，他憑藉過去軍事指揮征戰的威望與功績，得以召集軍事將領和官員於一堂，主持反攻督導會議，針對計畫作業室所擬定「反攻作戰準備重要事項」的作業程序，進行會議研討，凝聚反攻軍事作戰共識，做出重要的指示與決議，再將會議結果向蔣中正報核，最後交由中興作業室據以擬訂完整的反攻計畫。

但是隨著蔣經國肩負與美方交涉野龍計畫之責，在反攻大陸的角色日形重要，並極受蔣中正肯定之際，陳誠卻因深切體認反攻實力仍然不足、準備未周，在陽明山會談期間與蔣中正擦槍走火，爆發「草山爭論」的巨大分歧，即使陳誠仍被視為老臣謀國，但兩人在蔣中正心目中顯然已有升降變化。

以「反攻自當義無反顧」的陳誠，於草山爭論後仍然遵照蔣的指示，一方面為解決聯合國外蒙入會案與美方的爭議問題進行訪美，極力爭取美方對國軍反攻大陸計畫的支持；一方面也召集嚴家淦等人組成備戰小組，協調黨政軍各方，投入國光計畫的各項備戰作業中，為反攻計畫實施備戰不遺餘力，在財政仍然艱困的年代中出任艱鉅。

顯而易見，為國光計畫施行備戰作業時，軍費嚴重不足是首先面臨的困境，陳誠費心苦思，決定與備戰小組中熟悉財政、亦有絕佳默契的財政部長嚴家淦研議解決良策，惟懼怕軍事行動還未進行，經濟已先動搖，遂在嚴家淦妥善的財政規劃下，決議向立法院提出國防特別捐案，雖然極力突破反對意見，並獲得立法院通過，卻立刻引來美方關切，以美援為要脅。也由於美方對反攻計畫刻意延緩，反攻大陸計畫只得繼續等待。

總之，在蔣中정의反攻大陸計畫中，陳誠的身影雖不耀眼，但實際上卻扮演

著影響重大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隨時遞增，直至國光計畫的準備實施前後，實已至勞神焦思、鞠躬盡瘁的地步。大抵而言，陳誠熱切反攻，惟其肩負的任務係遵照蔣的指令，配合蔣反攻計畫進行的節奏，奮力前行，其中或有分歧，但只是腳步快慢之差距，朝向共同的目標——反攻大陸則無庸置疑。

徵引書目

一、檔案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23集〉。
-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25集〉。
-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26集〉。
-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27集〉。
- 〈石叟叢書一言論第30集〉。
- 〈石叟叢書續編一反攻大陸準備工作督導中心委員會議指示摘鈔〉。
- 〈石叟叢書續編一石叟言論集〉。
- 〈石叟叢書續編一軍事會談發言摘鈔〉。
- 〈石叟叢書續編一訪美專輯〉。
- 〈石叟叢書續編一談話錄〉。
- 〈行政院施政資料一四十年度〉。
-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工作總報告〉。
-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設計草案（一）〉。
-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會議重要參考文件〉。
-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會議資料彙輯（一）〉。
- 〈陳誠日誌一民國四十六年〉。
- 〈陳誠日誌一民國五十年〉。
- 〈陳誠日誌一民國五十一年〉。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一般資料一民國四十六年〉。
- 〈一般資料一軍事會談記錄（一）〉。
- 〈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七）〉。
- 〈作戰計畫及設防（三）〉。
- 〈動員及僑務〉。
- 〈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四）〉。

〈籌筆一戡亂時期（二十七）〉。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專案計畫—野龍聯合情報戰略計畫等〉。

〈蔣中正與甘迺迪往來函件等〉。

〈蔣經國訪美期間電文暨報導及陳誠訪美會談資料〉。

二、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節譯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2015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2015年。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臺北：國史館，2005年。

三、報紙

《工商日報》，香港，1956年。

《中央日報》，臺北，1953年

《聯合報》，臺北，1961年。

四、專書

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訢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6年。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9-1988）》。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涂成吉，《克萊恩與臺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07年。

孫宅巍，《陳誠晚年》。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5年。

五、期刊、論文集論文

張世瑛，〈蔣中正與遷臺後軍事最高決策機構的運作：以總統府軍事會談為中心〉，收入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年。

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

張淑雅，〈無礙反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的說服與宣傳〉，《國史館館刊》，第48期（2016年6月）。

陳紅民，〈合作中的波折—1960年前後蔣介石與陳誠關係之研究〉，收入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3年。

陳亮州，〈海峽戰局謀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計畫之分析〉，《檔案季刊》，第12卷第2期（2013年6月）。

楊善堯，〈最後的反攻軍事設計：蔣中正、陳誠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收入黃克武主編，《1960年代的臺灣》。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7年。

葉惠芬，〈蔣中正與反攻大陸計畫之制定—以「武漢計畫」為例〉，《國史館館刊》，第50期（2016年12月）。

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

六、學位論文

柴漢熙，〈蔣中正總統反攻大陸政策—計畫與實踐〉。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

張嘉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國共內戰（民國38年8月-民國39年3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